

任 鸿 隽 自 述

胡宗刚 整理

说明：任鸿隽（1886—1961年），字叔永。原籍浙江吴兴，因其祖父和父亲避乱至四川，故生于四川，清季应试，署籍巴县，遂为四川巴县人。1906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后游学日本，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返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北京临时政府国务院秘书，后赴天津任《民意报》编辑。1912年奉派赴美留学。在留美期间，除了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还曾为改良中国文字与文学与好友胡适展开过激烈辩论，终使胡适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引发新文化运动。

1918年归国后，任鸿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南京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极重要之贡献。尤以在中基会干事长任上，最能实现其“科学救国”的抱负，利用中基会的经济补助，尽量奖励全国各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又遣送有科学天才的青年到欧美去留学；对国内科学文化事业或为创办；或以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如北平图书馆、地质调查所、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营造学社等，皆为民国时期由中基会创办或资助的著名学术机构。

此两篇任鸿隽回忆自述，其写作目的都不是为了公开发

表，而是为其子孙留下一点他自己的切身历史记忆而已，故所述诸多近代史中重要事件，力求真实，皆具史料价值。再加上作者国学深厚，其文辞典雅，意境亦隽永，也可作文史掌故阅读。《五十自述》为作者 1937 年居庐山古青书屋时所写，以文言记其五十年生涯；《前尘琐记》写于 1950 年上海，以白话写其二十五岁以前的生活片段，是一幅清末民初的风俗画，饶有趣味。两篇所记虽有重复之处，实可互为补充。

此次整理刊出，得任鸿隽之嗣哲任以都先生同意。所据系原稿复印件，有难辨之字以〔〕示之。错误之处，恐为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胡宗刚识

五十自述

余先为浙江归安县（今为吴兴县）菱湖镇人。同治初年（二年？）太平天国陷湖州，吾祖轶才公始奉曾祖母沈太夫人率吾父章甫公入蜀，依叔祖秋萃公。曾祖诚斋公有子四人，长即吾祖轶才公；次不详，或幼即夭；次秋萃公，游幕在川；次某已长成，洪杨之乱为贼虏去，竟不返。故当吾祖避乱入川时，祖孙三辈三人而已。吾父生于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壬寅），至同治二年入蜀，盖年已二十矣。是时，秋萃公在川就某县宪幕，故吾祖等入蜀即居成都。未几曾祖母、祖父相继下世，而秋萃公无子，故吾父即兼承两房之祀，且从秋萃公习刑名焉。

浙湖为蚕丝出产之区，菱湖镇居民数万，以业丝者居其大半，吾家大约亦此中之一。但虽业丝而不废读，三祖秋萃公曾入邑痒，后复游幕，则犹是浙人之旧业。吾尚有一姑，适菱湖唐

氏，亦业丝者。闻唐氏贸易颇盛，洪杨乱后亦式微矣。犹记少时见唐氏姑丈所送吾父寿联，及姑母所贻吾兄弟姊妹初生时之小绣鞋，皆精致绝伦，年时则陈列玩弄以为娱乐。

秋苹公曾参四川总督吴棠^①制军戎幕，不久亦下世。死之年月及享寿若干，皆不可考，唯记真容所绘须发皤然，家人指谓，叔祖享年非高，而容貌耄老，殆因幕务过劳所致，理或然欤。秋苹公故后，吾父即弃幕而宦，纳贐为佐贰职，未几选授垫江县典史，于同治十一年到任所，遂以此终其身，而吾兄弟姊妹皆于是长养焉。

吾母氏闵，其先亦浙人之游幕来川者，以何时入蜀则不可考。吾母少于父七岁（生于一八四九年己酉），来归吾父当在二十许时。生吾兄弟四人，长伯兄鸿熙，生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乙亥）；次仲兄鸿泽，生于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庚辰）；吾次居三，生于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丙戌）；再次为季弟鸿年，生于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戊子）。姊妹三人，大姊最长，适四川涪陵舒自铭；次姊早世；三姊在家未字。吾生时，吾父年已四十四，吾母年三十七，故吾父母少年生活之情形已非吾所及知。唯自吾有知识以至两亲见背之时（一九〇二年）为止，吾记忆中所留者，为一雍睦快乐之家庭及和平宁静之生活而已。

吾兄弟姊妹幼时皆延师在家教读。垫江偏隅小邑，固不易得通人为童子师。记有徐甫唐先生，余等从事最久。先生于平常诵读外，雅好吟咏。吾少时耳濡目染，中年以后，虽人事牵绕而不废吟咏，或即以此。吾十岁时毕四书五经，于四书且尽读朱子集注，盖吾父欲吾还乡应试，当时习举业者，未有不习朱注者也。顾吾作八股文终未完篇。戊戌（时余年十二岁）维新之际，废

^①吴棠，字中宣，安徽盱眙人，道光十五年举人。《清史稿》有传。

八股，考试策论，吾作策论文颇为当地耆宿惊服。是时有某省进士赵哲濬来令垫邑，锐意兴革，修复书院制度，聘江北廪生艾缙光、巴县庠生胡成章两先生来长院。余亦报考为住院生。艾先生为重庆东川书院吕翼文先生高足弟子，治小学及词章有声；胡先生以算学为教，此在当时已属破天荒之举。余与季弟同住书院，始从艾先生治文字训诂之学，并点读《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等书。余是时为文既少年英发，治学亦极勤奋，艾先生极爱重之。每月考试必列第一名，终岁无改。余家既以宦游在垫，垫邑人士恐余等占其学额，常刺刺争闹不已。于是艾先生劝余往巴县应试，以为巴县考生在一万以上，“大而能化”，绝无攻击冒籍之恶习也。会甲辰（一九〇四年）之岁，为未废科举前最末一次考试，艾、胡二先生为吾于县府试时各“代”（代者，谓县府试时命人代作一卷，俾于院试时有一名字而已。）一名，至院试时，吾已考入重庆新立之府中学堂，不忍过拂两先生厚意，前往应试，结果以第三名被取为府学生。此吾占籍巴县所由来也。（吾父在时，无日不思返浙江原籍。吾辈则乡土观念较轻，以为吾中国人自命为中国人足矣，于此中复自划为某省某县人，有何意义，故遂听之。此逢场作戏时所不曾注意之一端也。）

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甲辰）废科举，兴学堂，实则是年犹科举与学堂并行。余所进之重庆府中学堂，则废科举后创办之第一中学也。虽名学堂，科举气习仍充塞堂中，次年科举全废，始渐成学堂形式。是时监督为杜少瑤先生，巴县举人而湖南候选知县也。教习则有梅黍雨、孔保之、杨沧白^①诸先生，皆一时知名之选。梅先生授外国史、世界政治、世界地理诸科，孔先生授国文、伦理等科，杨先生授英文。梅先生所授诸科，仅及导

^①杨沧白，名庶堪，生于 1881 年，重庆人。同盟会员。历任四川省长及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等职，为四川早期革命活动家，有诗名。

言，然上下古今，清辩娓娓，实有以后发智慧、开拓心胸之效。当时从学诸人之感想如何，吾所不知，吾个人之略解世界大势，梅先生后之也。孔先生之国文则授《马氏文通》，伦理则授严译《君己权界论》，于西方文字思想之大概，亦略有所得。杨先生年最少，来较晚，吾虽不获直接从事问学，然先生慷慨好谈国事，隐然以革命思想为青年领导。吾尤好从杨先生游，故吾之革命思想亦于此植其基矣。

是时当壬寅癸卯之后，《新民丛报》之势力渐浸入内地，但为政府所禁，学者得此报往往于深夜闭户读之。有人翻印梁任公之《灭国新法论》，读之尤令吾感动。因是种种感触，吾与同学在校，渐不以校课为满足，而时时作改革运动。学校当局亦深感吾济不易管制，而思所以除去之。于是设短期师范班，令吾侪以一年半毕业。吾亦无意久居于此，遂以乙巳（一九〇五年）毕业此校。丙午（一九〇六年）在重度开智小学及私立重庆中学任教一年，略储资斧，以备出外留学。是年之冬，校课既毕，余挟积蓄一百二十元，与同学友周君丙鲁、罗君锦张搭宜渝间之盐船东下，就学于上海之中国公学。吾自两亲见背，来重庆就学，处境极窘。在中学堂时，尝数月无钱付食费（是时食费每月仅二千四百文，约合银元二枚），承学堂监督杜少瑶先生借款偿付。又尝以三百文一万字之代价为人佣书。然无论如何困难，终不放弃求学计划。最后以教读所蓄，决然出游，吾所倚赖者，特百折不回之志气与患难相助之朋友而已。

中国公学者，日本明治三十七年发布取缔中国学生命令，留东学生归国所组织，以自为讲习之所者也。余至上海时，其校成立已年余。其程度仅为中等，而政治改革空气却极浓厚。余乐其与己见相合，故即居之。入校后之第一事即剪发易装，虽由此冒革命党之嫌疑不顾也。校中设大学预科甲乙班及普通科数班，余入校即居预科甲班。其课程为英文、数学、代数、几何、图画、

音乐等。代数、图画由日本教习经翻译教授，盖当时理科教师人才之难如是。同班学友后有名于时者有胡适之（原名胡洪驊）、但懋辛^①、苏鉴轩（原名苏明藻）、朱经农^②（原名朱经）诸君，不同班而交谊特厚者有朱芾煌^③、邓胥功诸君，不同校而同在上海时相过从者，有傅友周君，后三人又重庆中学堂同学旧友也。

在上海一年，所学虽较内地为满意，然有两问题迫吾加以解决。（一）吾之出游仅挟资一百二十元，彼时沪读生活虽视今稍廉，然此数决难支持甚久，过此更无办法；（二）则学课方面仅为中等程度，必不能就此即为卒业。故在是年之末，吾即亟亟谋所以继续求学之方。会是时邓君胥功已先去东京，与留东各友谋，由李雨田、李竹君两君每人每年借日币百元，为吾来东留学经费，至能考入高等学校得官费为止。余得是意外资助，遂于丁未（光绪三十三年）之冬，偕余君耀彤东渡。设无此数君之助，吾真不知何以自了，而数人之李君雨田，吾固素昧平生，乃不惜声应见求，倾囊相助，弥可感已。

余在沪时，所学以英文为主，东渡后乃改习日文，尽半岁之力，略能读书听讲，乃于次年秋进日人特为中国学生设立之同文中学，取得一中学毕业文凭。次年（己酉）夏，遂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习应用化学。于是吾之中学阶段乃告一结束，而此后即为官费生，学费学业皆可以无劳筹划矣。又在此期间尝从章太炎先生讲习国学，于形声、训诂及诸子源流之学略窥涯涘，亦可谓意外之收获也已。

① 但懋辛（1882—？），字怒刚，四川莱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四川陆军第一军军长。

② 朱经农（1887—1951），原名有野，后改名经农，江苏宝山（今上海）人。早年留日，参加同盟会，参与创办中国公学。

③ 朱芾煌，天津同盟会会员，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交厚。民国成立后任南京总统府秘书。

吾何以习应用化学？其动机则甚单简。盖自吾留东之次年，即已加入中国同盟会，为革命党员。同盟会之誓约曰“驱除鞑虏，收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此非先推倒满清政府不可。然当时之革命党员，大部分为未离学校之青年分子，于何处得此武力以推倒满清？于是激烈者则趋于暗杀之一途。暗杀必须炸弹以作武器，于是党员中有自行制造者，蜀人之喻培伦^①、黄复生皆曾以制造炸弹受伤者也。余既获交喻、黄两君，亲见其断指伤目之状（皆以制造炸药受伤），思有以继其事。且以为从事制造而不明化学，必且事倍而功半，于是决计学习应用化学。质言之，吾此时之思想行事，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其入校而有所学习，不能谓其于学术有所企图，即谓其意在兴工业，图近利，仍无当也。

同盟会之成立，远在壬寅癸卯之交。是时吾方在重庆读书，犹记当时得见由东京寄来孙中山先生在锦辉馆欢迎会上之演说词小册子，兴奋之情不容自己。迨丁戌之际，吾东渡留学，孙先生已不在东。时则章太炎先生主《民报》，章先生而外，黄克强^②、张溥泉^③、陶焕卿^④诸先生犹时于会场中见之，汪精卫、胡汉民^⑤

①喻培伦，字云纪。

②黄克强（1874—1916年），名兴，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

③张溥泉（1882—1947），名继，原名溥，河北沧州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任同盟会交际部主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长。1927年后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立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④陶焕卿（1878—1912），名成章，浙江绍兴人。清末革命党人，光复会领袖。辛亥革命后，被举为浙江都督。1912年1月，陈其美串通蒋介石将他暗杀于上海。

⑤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人。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民报》创刊后任编辑。1907年随孙中山到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策动两广起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秘书长。

则始终未见，想亦随孙先生他去矣。同盟会之组织，全国有总会，国内外各省区有分会。吾所加入者为四川分会，后渐任四川分会书记、会长等职，与各省分会长同参与总会事务。犹记辛亥黄花岗之役未起事前，曾从日本志士宫崎寅藏^①谋购买军火。辛亥武汉革命事起以后，由总会资助留东同志归国者若干人，皆吾为之经纪。吾是时所最感快乐者，即平时好友不知其同属革命党人，偶于秘密会中遇之，于狂若〔喜〕之余，交情亦愈浓厚；最痛苦者，广州之役，亲送许多至友前往参加，一旦败耗传来，真如天崩地裂，万念皆息。而武汉事起后，吾经理各事略已完结，最后乃抛弃一切书籍行李，挈小箱萧然上船，为归国投军之举，尤平生未有之乐事也。

当辛亥革命事起，吾弃学返国时，革命军在武汉已失汉口、汉阳，处于不利地位，而川中自争路风潮发生后，端方^②带兵入川，尚持官民相持之局面。于是川中革命党人之在沪者，群议组织蜀军，入川赴难，推熊君克武^③为统帅，而余与季弟皆参戎幕。然入川必经过武汉，北军乃敌人，不可与谋，可与谋者唯当时武汉军政府，于是余与另一川人李君某（其名今已不复记忆）被推至武汉接洽蜀军返川事宜。余等抵武昌，适值汉阳冯军炮轰省议会（当时军政府设是处）之后，黎元洪^④都督避居城外洪山

① 宫崎寅藏（1871—1922），日本熊本县人。清末结识孙中山，为兴中会的反清革命活动而奔走。

② 端方（1861—1911），姓托忒克氏，字午桥，满洲正白旗人。曾任陕西按察使，山西、河南布政使，湖南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

③ 熊克武（1885—1970），字锦帆，四川井研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曾任川军第五师师长、川东讨袁军总司令、四川督军。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④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武昌起义后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副总统。1916年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继任总统。

寺。余等追随而至，是夜即宿黎君卫队长川人冯君忠信处。冯君告余等，是日适值杀羊犒士，故饮食颇丰盛饌。又当时卫士皆作汉装，宽袍岸帻，执刀而立，与戏台上之武士装束无异。余是时亦颇致疑，以如是军人其果能成革命大业耶？是夕军政府得重庆电，知四川已宣布独立，推张君培爵为都督，此吾后来作《袁张列五》诗所谓“小子敢遑息，扁舟谒大汗。朝食从驺卒，夕卧杂曹掾。夜阑方秉烛，一纸出中翰。伸臧喜欲舞，独立布长电。电尾署君名，渝都督印按。固知豪杰士，乘时有胜算”。皆是也。于是黎君及军府中人皆力劝蜀军不必返川，即留长江下游共御北军。余乃与李君返旆而东，仍居沪上。

是时武汉局势虽颇危急，而浙沪之革命军则已会攻南京，取为根据地。于是各省代表及革命党人麇集南京，谋组织政府以与清廷对抗。适是时孙中山先生自海外归，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将于一九一二年元旦赴南京就职。胡汉民先生任总统府秘书长，征选僚佐，遂及不才。余乃以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卅一日随中山先生及新政府人员赴南京。记是晨上海北车站由沪军戒备，站中军队密布，每一军士之枪上皆插是时沪军主用之五色小旗^①一面，弥望如云，气象森严而壮丽，印象至今不灭。

临时政府成立期间为一九一二年一至三月，此期间余在总统府秘书处任总务，于撰拟文告外，时亦参与政务处理，故得于政治情形略有所见。当时同在秘书处任职者有川人李伯申、熊斐然、吴玉章^②，李、熊二君皆兼任参议院议员，担任议会与行政

①五色旗，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用之国旗。五色即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② 吴玉章（1878—1966），名永珊，字树人，号玉章，四川荣县人。1888年入自贡书院，1903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10年弃学回国，与黄兴策划广州起义。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秘书。1913年留学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后又赴苏联学习。1939年赴延安。

机关之联络；鄂人石衡青（瑛）^①、但植之（焘）^②，陕人张季鸾^③，粤人易廷熹、萧友梅^④等，相处甚洽，而于汉民先生之处事明敏，尤极叹服。

临时政府既解散，常任政府职务诸人，在势可北上继续其作官生涯，余以学业未成，应继续求学，为将来国家储才备用，乃倡议请政府资送西渡留学美国，此即民国元年稽勋局大派东西洋留学生所由来也。时留学之议虽得政府允可，而政府中如蔡子民、胡汉民，朋辈中如李伯申诸先生，力挽余留国内从事政治及言论事业。余虽未能改变素志，而于诸先生盛意则颇感激，出国前仍北来任唐少川^⑤总理国务院秘书及天津《民意报》总编辑各数月。唐少川内阁为南北统一后第一任内阁。是时内阁总理为唐绍仪，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外交陆徵祥，内务赴秉钧，交通施肇基，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未到，任由王正廷以次长代理），皆一时人才，极南北之选。

①石衡青（1876—？），名瑛，湖北阳新人，举人出身。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弃职赴欧，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历时九年。1922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等校。

②但植之（1881—1970），名焘，字植之，又名荫孙，湖北蒲圻人。肄业经心书院。1903年赴日留学，攻读海商法，获法学学士学位。民国成立后，从政多年，曾任国史馆筹备处总干事，1947年任副馆长、馆长。

③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字季鸾，陕西榆林人。青年时习经史，1909年留学日本，习政治经济学，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上海参加《民主报》工作起，终身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大公报》主编。

④萧友梅（1884—1940）字雪明，又字思鹤，广东中山人。早年赴日留学，并加入同盟会。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1913年赴法学习音乐，后为著名音乐家。

⑤唐少川（1860—1938），即唐绍仪，字少川，广东中山人。留学美国。曾任清廷铁路总公司督办、奉天巡抚等。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据大总统，任国务总理，不久辞职，后参加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曾任国府委员，参与国民外交事务。1938年在上海被刺死。

余在国务院任国务会议记录事，每会议则列座记录，得闻阁员诸公言论。当时感想，以为以全国仰望之人物，论道经邦，而所表现者不过尔尔。然则所谓总理、总长，岂足为哉，吾厌弃作官之念乃益坚决。《民意报》者，当时北方革命党人之机关报也。名义上之总编辑为汪精卫。汪先生既不能躬亲其事，乃由赵君铁樵为总经理，约吾与李炳英、丁 敬音诸君共负编辑责任。是时袁世凯虽号称赞成共和，而行为跋扈，于同盟会党人尤多方妒害，余等在《民意报》中首发其奸，严词斥责，卒为袁氏禁令停版乃止。

吾以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冬间出国，到美恰为耶诞前后。同行赴美者凡十一人，同到康乃耳大学者则唯杨君杏佛一人。吾等何以独赴康校？以同行诸人志习政治经济及社会学者为多，独吾与杨君志在科学。康校在美国，固以擅长科学著称，且是时胡君适之已先在此校，时时绳康校风景之美以相劝诱，吾等遂决计就之。及今缅想前事，吾固甚幸决策之未谬也。盖吾人出外游学，于所学功课外，尤应注意两事：一为彼邦之风俗人情，一为朋友之声应气求。是二者皆于每人之学成致用有绝大关系。康校于此二者皆曾与我以难得机会，此可于以下各段所述明之。

当前清末留学之风盛行，然留学东京者每不以为满足，而必以远历欧西为鹄的。此在浅见者流，或以为当时世论以为东洋学生不如西洋学生之有价值。其上者以为东洋学术既皆从西洋贩运而来，则何如直探源头之为得。此言似矣，而未得其至也。不知人类文化之分途，社会组织之基础，东西洋实有其绝不相同之点。东洋文化吾中国为一大宗，日本不过拾中土之唾余，倚西学为灌溉，以此骄人，已足汗颜，新意启予，夫岂可得。一至西方，耳目顿易，以西与东较，正如南北两极，方向相反而同不失为一种准则。例如家庭组织，东主合居，西主分处；男女恋爱，东主防闲，西主放任；个人发展，东主裁制，西主自由。凡此皆非远涉重洋，身入其境，不能收观摩之效。故未到西方即侈言东

西异同，甚且评论得失，固不免扞龠谈日之病；即到西方而徒撷拾其一技一能，侈然自以为足，尤不免宝山空回之感。吾等当日向往西洋，千回百折，有不到黄河心不甘之慨，固不在博士、硕士头衔资格间也。

吾居康校三年有半，毕业于文学院而偏重科学中之化学、物理等科。论功课成绩吾不敢自谓有异于常人。顾吾此时于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以谓西方学术乃至西方文化之所以异于东方者，一言以蔽之，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或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故所谓科学者，决不能视为奇技淫巧或艺成而下之事，而与吾东方人之用考据方法研究经史无殊。特其取材不同，鹄的各异，故其结果遂如南北寒燠之互异耳。同时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介绍整个科学。盖科学既为西方文化之泉源，提纲挈领，舍此莫由。介绍科学不从整个根本入手，比如路见奇花，撷其枝叶而遗其根株，欲求此花之发荣滋长，继续不已，不可得也。以此考虑，吾于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夏间在康乃耳大学与同学十余人发起中国科学社，其目的在以提倡研究，谋吾国科学之发达。其入手方法则发行一科学月刊，以为传播鼓吹之工具。当时草拟章程、编辑文字，以杨杏佛、胡明复、秉农山、赵元任、周子竞、邹秉文诸君为最热心。一经发表，响应赞助之声乃遍于国内外与朝野上下。故此社自成立迄今已二十余年。民国三年一月创刊之《科学》杂志，今当继续出版。社中事业则有图书馆，有研究所，有科学印刷公司。其出版物，则除上述之《科学》月刊外，有每年一次之《语文专刊》及每半月一次之《科学画报》。说者谓吾国近年来，对于科学在西方文化之地位及科学本身之重要渐有真知灼见，微此社之强聒疾呼不及此。藉曰有之，斯固得于社员诸君之努力与社会一般之同情，而为吾发起此社之十数人所始愿不及者也。

康校所在地为纽约省之伊萨卡城。此城人口仅一万余，而康校之学生人数已占五六千，盖美国普通之所谓学校城（College town）也。其地风景既佳，人民淳朴，无贫富阶级之悬殊，故常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吾等居此，时时尚想黄虞，以为吾人昔时所蔑视之野蛮人乃能有此，然则吾炎黄神胄不当愈发奋自勉耶？既思此邦之人所以能如此者，非必其性独善，盖以家给人足，无衣食冻饿之忧故耳。故吾当时治学之目的，仍以化学工程为归，唯异于在东京时者，此时思用化学以兴工业，不为制造炸弹之用矣。以此之故，吾于一九一六年在康乃耳毕业后，即改赴哈佛及麻省工科大学，最后至纽约之科仑比亚大学，盖以此数校之化学工程课程皆较康校为优耳。

在康校时尚有一事虽不必与吾有直接关系，而世论往往以吾名附于骥尾之末者，则所谓文学改革之白话运动是也。此事之起源，盖由一九一六年夏间与梅迪生、杨杏佛两君在伊萨卡歇夏，胡适之君时已去纽约，时时以白话诗相示，余等则故作反对之辞以难之，于是所谓文言、白话之争以起。平心而论，当时吾等三人虽同立于反对白话之战线上，而立场殊不尽同。迪生之反对白话盖为全般的，凡以白话为文者皆在其反对之列。吾则承认白话有其用处，但不承认除白话外无文学，且于白话诗之能否成立为尤断断耳。然白话、文言之论战，由吾等数人开之，则确无疑义。

在离康校以前，尚有一事与吾关系最大，不可不记者，则为一九一六年夏与陈衡哲^①女士遇于伊萨卡是。余读陈女士之文而识其名，盖自前一年余主编《留美学生季报》得陈女士投稿始。

^① 陈衡哲（1890—1976），号莎菲，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西洋史教授、史学系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史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等。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史》及文学作品《小雨点》等。

当时女士所为文曰《来因女士传》，盖传孟河女子大学创办人来因女士而作也。文词斐然，在国内已不数观，求之国外女同学中尤为难得。余心仪既久，一九一六年夏，与陈女士遇于伊萨卡，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订终身之约焉。结婚后吾尝为联语以自贺云“清香合【供】来因传，新月重填百字词”。上联指订交所自，下联则记吾人文字唱和时曾有百字令新月之作也。

一九一七年春间余已就学科伦比亚大学，与陈女士所住之瓦沙女子大学为程火车三小时可达。会胡君适之亦与陈女士订交而未晤面。余乃于春假之暇约适之往颇基卡舍为访陈之行。此后吾三人邮筒往返几无虚日，朋友之乐，于斯为盛。此适之《尝试集》中所以有“我们三个朋友”之作，吾亦作减字木兰词以答之。

吾以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秋间返国。是时欧战方终，世界民众暂得苏息，吾国则南北对立之势已成，北举徐世昌为总统，南则于广州设护法政府。吾回国后，首欲遍历南北以观国中局势，并为科学社募集基金。是年之杪至广州，晤当时广州政府抚军长岑春煊^①，外交部长伍廷芳^②。此二人皆吾自有识以来所耳而目之，以为大人物者也。是时汪精卫先生方养病长堤一教会医院，既彼此多暇，因得时时继见。次年开岁至北京，得当时教育部长傅沅叔^③先生之赞助，于科学社基金颇有所获。在沪时则时时造访孙中山先生。是时先生居莫利哀路私宅，方造述《孙

①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清举人。历任广东、甘肃布政使，陕西、山西巡抚，两广、四川总督。1918年参加护法政府，后蛰居上海。

②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早年留学英国。曾任清廷驻美、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辛亥革命后，多次出任外交总长，为著名外交家。

③傅沅叔（1872—1949），名增湘，四川江安人。民初历任肃政厅肃政员、教育总长等。

文学说》，历举平常生活智识以证所谓“知难行易”之有据。承先生以有关科学部分属为校读，并力言留学生应自组织以图于国家有所贡献。余因为先生言科学社之组织，先生亦颇谓然。此后此社事业国民政府多所协助，盖承孙先生之志也。

民国八年春余返四川，盖距吾离川时已十二年矣。是时季弟已歿（民国二年在西湖闻袁世凯窃国，发愤投葛洪井死），伯仲两兄犹健在，居重庆。而熊克武君适任四川督军，故成渝要道多留东故友。是年夏余首至成都。适熊君欲办一炼钢厂，余意苟能以钢铁两厂相辅而行，为四川立钢铁工业之基础，亦事之可行者也。熊君亟然吾言。于是是年之冬，复偕周子竞^①君渡美，为调查炼钢方法之举，而以筹办铁厂事属傅君友周、姜君荣光。是二君者皆川人，而在美国加洛纳多矿冶学校以高材毕业者也。余与周君在美调查之结果，决定用电炉法制钢，因为购订发电及电炉各机件。次年返国，值川中有一二军之战，熊君去位，继任者未遑远略，于是吾之钢铁厂计划遂归停顿。然十余年后，中国有倭寇之难，当局汲汲图兴基本工业，于四川设钢铁厂，其炼钢机器仍取资于吾当日所购者。周君子竞后任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以制造特种钢料有声于时，其学力仍得自在美调查之功云。

吾第二次自美返国，为民国九年之夏。是时西南各省颇多纷扰，钢厂事既无法进行，北京大学校长蔡子民先生、教育部〔总〕长范静生^②先生闻吾暂不西去，乃以教育事业相挽。而陈衡哲女士（是时吾人已订婚）亦受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之聘，

① 周子竞（1892—1973），名仁，江苏南京人。冶金专家，中央研究院工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

② 范静生（1876—1927），名源廉，湖南湘阴人。湖南时务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曾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次长、总长，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

余乃决计北上。初任北大化学教授。嗣范先生挽余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长，余于是辞北大教授而专任部职。余平生作事有一信条，即一时只任一事，必不脚踏两只船以自便而误事。盖吾见当时事业之败坏，由于一人之包揽而不负责者占其大半。此在精明强干智力过人者犹不克免，况余孱力薄才而敢效尤以负社会耶？此信条吾至今仍信守之。

任教育部事不及一年，会范先生以教育经费风潮去职，余亦舍去。民国十一年夏间返川，冬间出川居沪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十二年冬至南京，任东南大学副校长。东南大学者，承江南优越师范及南京高等师范之后，尝为江南教育界新旧势力角逐之场。当时校长郭秉文^①君与江苏教育会接近，甚为新派诸人所不喜。会民国十三年冬，南方民党势力浸入北方，素不嫌于郭者遂因而倾之，浸以酿成民十四春间殴辱新校长胡敦复^②之风潮。余既不善两派所为，又无法加以阻止，乃辞去东大职务而闭门著书，成《科学概论》六万余言。

十四年夏，范静生先生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干事长，复以该会专门秘书见征。中基会者，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所组织，以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为职志者也。吾自民国七年返国，以发展科学之重要强聒于国人之前，顾响应者寡，尝苦无力以行其志。今得此有力机关，年斥百余万金钱以谋科学事业之发展，是真吾所寤寐以求，且以为责无旁贷者也。于是欣然应召，于十四年八月重至北京。由此时起直至二十四年

① 郭秉文（1880—1969），字鸿声，上海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长、校长，东南大学教授、校长。后任实业部工商访问局局长。

② 胡敦复（1886—1978），江苏无锡人。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毕业。返国后，任清华学堂教务长。1921年在上海创办大同学院，1922年改为大同大学。长期主持大同校务处，并兼各大学教授。1949年去台湾，旋赴美。

秋入川任四川大学校长为止，吾皆在北京致力于科学及文化事业。在此时期中，吾由专门秘书而执行秘书而副干事长而干事长，中基会之事业，由纯粹保管款项机关进而为推进科学文化之有力组织。吾尝闻范先生言：“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得为各国退还赔款之先声，故中基会不可不为将来此种组织树一模范。”吾又尝自思，吾国近来教育事业之无成绩，率委过于经费之不足，今既有款矣，吾人将拭目以观事业之成绩。中基会之事业，每年具有中英文报告公诸世界。其所建树是否合于该会组织之目的，愿明眼人平心论之。

使吾生当承平之世，得尸位一基金会之执行领袖，目击所创办之教育文化事业，继长增高，日就发达，亦可以自慰以终余年。顾自民国二十年秋“九一八”事件发生，全国命运忽然入于惊涛骇浪之中，而莫知所措。吾乃自计，中基会之事业既已规模大备，此后虽有润色，后贤其必优为。内地都塞之乡，其有待于吾人之努力，必且较大都市之文化事业十百倍之。于是民国二十四年秋政府以四川大学校长见征，余遂毅然辞去中基会事务而就川大校长。

昔读陶渊明诗有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复亲此事。”尝有“五十之年忽焉已至”之感。吾生于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迄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恰为五十年。是年又适为吾任职中基会之第十年。余本意欲于任事十年期满时请资出国游历，为已往告一段落，为未来别图建树。不意民国二十年秋“九一八”事件发生，民族命运忽然陷于惊涛骇浪之中。小子何人，敢遑暇逸。故民国十七年政府以四川省政府委员及教育厅长见委，二十一年复以中央大学校长见征，吾皆谦让未遑者，至二十四年再被四川大学之命，乃不得不奉命驰驱。计任职两年，为定改建学校计划，筹定建筑费三百万元，复厘定课程，改正学风，期以三数年之努力，跻是校于当今学校之林。